

中华蒙学经典英译的生态翻译研究

黄春莲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3

摘要:作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蒙学经典在继承和发展中国道德教育、思想文化的历史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们的英语翻译不仅对促进国家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之一。然而,由于中国蒙学经典所包含的深厚文化背景等因素,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误读或冲突。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准确把握译者、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践行中国蒙学经典的生态价值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蒙学经典,生态翻译学,英译

引言

受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潮流的影响,寻求一种既有共同哲学原则,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翻译理论模式势在必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在原文、译者和译文之间找到一种生态、健康、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即生态翻译学。它源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其核心理论是翻译适应性和选择性理论,主要包括两个翻译过程:(1)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元素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即“自然选择译者”。(2)译者选择翻译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即自然选择翻译。生态翻译学不仅为翻译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加系统和客观的视角,而且避免了以原文和译文为中心定位。

截至2022年10月,国外对中国蒙学经典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主要局限于一些汉学家和传教士(Giles)。(2)更大程度上借助某种经典著作(如《三字经》)达到传教目的。(3)没有相关论文和学术专著清楚地解释学者们在中国蒙学经典翻译方面的相关成就。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相关学科(如美学、语言学、解释学、伦理学和诗学)的理论观点,对翻译作品和翻译现象进行评价和分析。(2)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因素,如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策略、翻译接受等,以讨论译者选择的具体翻译策略。(3)他们的海外传播有助于探索传播中国蒙学经典和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主要对两部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蒙学经典进行了研究。第一个是《三字经》,只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研究。(1)罗迪江(2018)在《国家翻译》杂志上发表了《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诗歌翻译形式思想——以《三字经》为例,探讨如何在诗歌翻译中翻译形式》。(2)李月霞(2019)出版了《三字经》两个英文版本的比较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探讨《三字经》的翻译策略。第二个是周希陶的《增广贤文》,只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研究。(1)曹志艳(2018)出版的《关于增广贤文翻译策略的选择》——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探讨如何实现三维转换。(2)欧海英(2021)出版了《增广贤文英译对比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说明哪一个英语翻译版本(赵彦春,胡晓阳,郭著章)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更好。

然而,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国内外对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1)译者如何适应中国蒙学经典的生态翻译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2)译者如何实现从选择性适应到适应性选择的转变,并成功实现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多维整体适应和选择。(3)通过问卷调查,对中国蒙学经典翻译质量评价的实际具体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此文将着眼于上述三个研究不足,以弥补研

究差距,实现中国蒙学经典的生态价值,实现文学课程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蒙学教育

蒙学教育主要是指在舞勺年(13-15)之前对儿童的教育。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需要。它在继承和发展中国道德教育、思想文化的历史,不断发展整个中华民族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蒙学教育教材

蒙学教育教材是指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儿童的认知特点和智力发展需要为参照,为实现启蒙教育的目标,满足启蒙教育需要而编写的各种启蒙教育书籍。此文所探讨的启蒙经典是基于各种启蒙阅读材料及其包含的各种内容。

中国蒙学经典的西方翻译研究

中国的蒙学经典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史籍时期。《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是西方翻译和介绍的第一批启蒙书籍。据统计,《三字经》约有50种版本,《千字文》至少有16个版本,和大约11种版本的《弟子规》。从翻译活动的繁荣来看,蒙学经典翻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世纪至19世纪的繁荣期、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沉默期和80年代至今的复兴期。

18至19世纪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繁荣时期。蒙学经典翻译的兴起始于俄罗斯传教士。18世纪,《三字经》四个俄文译本的译者都是布道团体的成员。1740年左右,罗索兴将《三字经》和《千字文》翻译成俄语,但尚未出版。在俄罗斯首次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是阿列克谢·列昂德耶夫(Alexei leondyev)的翻译,并于1779年印刷,1829年俾丘林出版翻译了《三字经》。

19世纪,启蒙经典翻译越来越繁荣,不同语言的翻译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莫里森、E.C.布里奇曼、内曼、马兰、马杜斯、朱利安、秦佑、Giles、郭东辰、奥黛丽、霍夫曼、艾伦比和修德翻译了《三字经》和《千字文》,他们的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瑞典语和意大利语。《三字经》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出自莫里森,于1812年出版。《千字文》的第一个英文译本来自修德,以散文形式翻译并于1831年出版。1873年,翟里斯翻译了《三字经》和《千字文》,后来在1900年,他修订了《三字经》的译本。1895年8月,美国传教士黑德兰出版了《弟子规》的译本,这是该书的第一个英文译本。

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国蒙学经典的翻译活动急剧减少,翻译的影响相对减弱。1902年,德国汉学家魏礼贤出版了《三字经》的德语译本。后来,珀西赫翻译了《千字文》并于1925年在《公报》

上发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汉学热”使国内文化经典翻译进入了复兴时期。1989 年,潘世兹出版了《三字经》的英文译本。1990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道德系列”。王书锦、何功杰、文振宇、王秀良和范怀秋都翻译过《三字经》。

在 21 世纪,经典作品的翻译和引进正如火如荼。2007 年,孟凡君的《三字经》和彭发声的《千字文》被纳入大中华区图书馆。2012 年,第一部阿拉伯语《三字经》(李文玲译)已发布。2014 年,赵彦春出版了《英韵三字经》。2016 年,赵彦春出版《弟子规》和《千字文》,其中英语千字对应汉语千字,韵律优美。

然而,现有的对中国蒙学经典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它们的英译和传播。由于它们独特的节奏和韵律特征,很少被触及,尤其是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生态教育价值。

中国蒙学经典翻译中的问题及原因

由于中国蒙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语言特征、思想内涵和深厚的文化背景等,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主要问题分别是(1)没有反映出原作的具体语言形式。(2)英语翻译模棱两可、不准确;(3)由于中英语言的差异,使一些英语版本偏离原文所述事实或误用典故。(2)对意识形态内容的理解不准确;(3)文化内涵的差异。

问题

1. 未反映原作的特定语言形式

以“性相近,习相远。”为例。翟里斯将其翻译为“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翻译为两句,19 个单词,不能对应原文每行中的三个单词。它只是对外语原文的一种语义解释,译文不能形成独立、自足的经典文本。

2. 英语翻译含混、不准确

以“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为例。“陶器”和“丝绸”的翻译并不准确。“陶器”是陶器的总称,而“陶器”作为乐器很难达到预期的转喻效果;“丝绸”是一种特殊的布,而不是“弦乐”中的弦,这导致了概念上的错位,八种乐器的通称“八音”没有翻译,意思是“发出那八种音乐的声音”。王宝童翻译成“上帝,陶器,皮革,木材,金属,石头,竹字,串在一起,发出动人的音调。”“陶艺”是“陶器”的总称,这不够准确。本译文中没有“八音”的概念代码,也没有必要添加“移动”一词。简而言之,这两个版本没有准确翻译八种乐器以及“八音”的翻译被省略了。

3. 一些英文版本偏离原文所述事实或误用典故

以“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为例。融,在四岁的时候,他愿意分享他的梨子。作为一个弟弟对待长辈,是首先要知道的事情之一。”(赵彦春,2014:53),其中“让梨子”的行为是一个既成事实,以说明“爱与尊重”的含义,而“愿意”则表示意外事件。“分享”只意味着“分享”,不能体现“孔融”所包含的礼让,并不能充分传达文化信息。王宝童的翻译中,“狮字的份额”来自伊索寓言,讲述狮字的暴政和贪婪。预期的翻译彻底改变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典故的误用不仅失去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也导致了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原因

1. 中英语言的差异

就整体结构和表达而言,英语是形合语言,而汉语是意合语言。英语句子一般按照固定的结构和形式组织和表达,强调形式;汉语句子根据词义组合连接,表达灵活,强调语义。英语通常是“开明

的”,先表明结论,然后演示、描述或讲述事实。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先结果,后原因”,即关注“结果”。中国人习惯于“循序渐进”。它经常根据事物的发展顺序从事实到结论或从原因到结果来讨论事物。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先原因后结果”,即关注“原因”。基于上述中英文差异,译者在将中国蒙学经典译成英文时,很难保证目标语言的准确性,也很难保留源语言的语言形式。因此,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英语翻译版没有很好地反映其特定的语言形式。

2. 对思想内容理解不准确

蒙学经典的语言是精炼的,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果译者不能准确理解或表达其思想内容,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内容的流失。例如,翟里斯将“凡训蒙,需讲究。详训诂,明句读。”翻译成“I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 there should be explanation and assistance, / care teaching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ommentators, / and due attention to paragraphs and sentences”(赵彦春,2014:176),其中翟里斯误解了“讲究”一词,并将其分为“解释”和“渗出”,没有“训诂”和“句读”的信息。王宝童误读了“详训诂”和“明明句读”。他把它翻译成“每一个字都要知道”,意思是“知道每一个汉字”,“每一行都要读”,意思就是“读每一行文字”。原文中的两个字分别表示“用训诂方法研究,或阐明学习内容”和“让学生了解阅读文章时如何断句,如何理解文章开头的衔接手段,文章的过渡和过渡,以及如何掌握句字之间的语义连贯”(赵彦春,2014:178)。这些误译和不足使中国启蒙儿童的内容和思想内涵几乎完全丧失。

3. 文化内涵的差异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是女性文化,西方文化是男性文化。中国的“女性文化”在中国经典中没有明确表述,而是包含在内。以“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为例。“丽水”指金沙河流,“昆冈”指昆仑山。相传金沙是一个聪明、善良、美丽、理想的女孩。昆仑山上是“西王母”的居住地,她是一位长着豹头的女神,由两只绿色的鸟供奉。然而,这种文化内涵并没有在翻译中体现出来。王宝童将这句话翻译成“金沙溪在黄金之上, / 从库伦山上找到玉石。”虽然这句翻译有意义,但它并没有表现出“丽水”中所包含的“女性文化”。“金沙”属于归化码,音译为“昆仑”属于异化,两者都不能与阴联系(阴)。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中会偏离原文所述事实或误用典故。

相对而言,中国蒙学经典翻译研究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符合并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发展方向和时代要求,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Darwin, C. (1952).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descent man and
- [2]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Chicago/London/Toronto/Geneva/ Sydney/Tokyo: William Benton, Publisher.
- [3] Giles, H. A. (1900). Elementary Chinese: San Tzu Ching. Shanghai: Messrs. Kelly & Walsh, Ltd.
- [4] 胡庚申. 2013.《生态翻译学》,商务印书馆.
- [5] 赵彦春. 2014.《三字经》. 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简介:黄春莲,1981 女,汉,湖南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410203,讲师,研究生(玛拉工艺大学在读博士,文学翻译)。